

# 社会主义历史潮头的深沉思索和坚定信念

## ——重读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

陈立人<sup>①</sup>

对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的解释,历来囿于“关心渔民、歌颂新中国”一说。此说集中见于周振甫先生的《毛主席诗词浅释》一书。周先生解释“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为:“大雨中‘白浪滔天’的海上景象,是波澜壮阔的,是非常雄壮的,诗人具有阔大的胸襟,所以爱这种雄壮的景象。”<sup>[1]</sup>却将“秦皇岛外打渔船”从上韵(句)中取出,与“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合为一韵句解释,因而“知向谁边”是诗人看不见渔船,流露的是对渔民的关心之情;下片则是诗人抚今追昔、追述魏武,歌颂新中国“换了人间”。

笔者认为《浪淘沙·北戴河》虽或有“关心渔民”的情怀,但词的意蕴远不止此。重读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词,不揣浅陋,愿以此文就教于毛泽东诗词专家和爱好者。

依《浪淘沙》的谱式,上片应为两韵句:前三逗为一句,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后两逗为一句,即“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周先生将第三逗置于下韵句一道解读,既乖句法,又有损意境。我们知道,雄壮的景象只有作为人类主体的背景或对立面,才具有思想和艺术的价值。将“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与“秦皇岛外打渔船”割裂开来,词作本有的物与我、人类与自然对立统一相搏相存的壮阔意境被淡化了。君不见,在无遮无拦的骤雨、令人惊恐的巨浪中,秦皇岛外的打渔船,仍然安详地飘浮在海面上,显示的才是人类主体对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客体世界)之巨大运动的超越和从容;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自然的律动同渔船飘浮搏击的冲突,撞击出的恰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豪情。其次,作词之法,上片末句当为下片词意之引。《浪淘沙·北戴河》是上片写景,下片述史;上片呵

问,下片作答。“知向谁边”若是“关心渔民”、坐实地问渔船哪儿去了,则此问同“魏武挥鞭”的联系是什么?魏武临大海而从容,当代渔民,倒在大风大浪中叫人担心,更何况“换了人间”!常识也告诉我们,“打渔船”在急风险浪时应在秦皇岛外港中,即使渔船有险,那也是调遣海上救护的实际工作。很显然,“知向谁边”并非问渔船在哪儿。

诗人因何发问,意蕴是什么?应从其特定历史地位、诗词风格、吟咏之际所面临的现实和内心世界诸方面分析。

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伟大的贡献,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其诗歌既是中国革命的诗史,也是一代伟人上下求索的心灵记录。从每个历史转变的重大关头看毛泽东的诗歌,多是以书写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深沉思索和坚定信念为诗歌的主旋律和基本内容的。《沁园春·长沙》(1925年秋)、《菩萨蛮·黄鹤楼》(1927年春)、《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皆如此。

《沁园春·长沙》上片写景,下片则追述往事。1925年,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革命浪潮高涨中,诗人大声疾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反映了诗人对潜伏着的革命危机的深刻洞察,包含着诗人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课题的深切思考,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和原动力问题。下片以对“同学少年”的热烈呼唤、“中流击水”的这一富有特定内涵的造型,凸现出身处赤潮中巍然挺立的革命者形象,表现了诗人刚毅果决的胆识和意志。遗憾的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为当时的党中央所接受。《菩萨蛮·黄鹤楼》则作于1927年春。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尤其是对农民

① 收稿日期:2007-10-18

作者简介:陈立人,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高教管理。

革命的领导权,大革命失败迫在眉睫。“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空旷,“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沉寂,是武汉三镇风景点睛之笔,是当时风雨纵横政治局面的艺术概括,也是诗人苦闷苍苍心境的真实写照。“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是惆怅,是感叹,更是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大革命失败后,心情总是凉苍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春季。夏季八月七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斗争,从此找到出路。”<sup>[2]</sup><sup>326</sup>毛泽东对《菩萨蛮·黄鹤楼》的自注,是该词思想内容最明确不过的概括和说明。词的末句虽不同于《浪淘沙·北戴河》那响彻千古的大声宣告,但抒情主人翁“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大江之祭,足显壮怀激烈。1935年10月《清平乐·六盘山》写于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别开生面之时。诗人立马六盘,问“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依其自注,是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民族存亡的大问题的思虑。其不同以上之作处,是问句作结,而信念和答案则在“不到长城非好汉”、“红旗漫卷西风”及全词之中。与《清平乐·六盘山》同时之作《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上片写景,呵问莽昆仑:“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下片则以“倚天抽宝剑”,裁昆仑为三截,谋求“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赋写,抒发了抵御外侮、重整河山、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志向。

再作更细致的比较就不难发现,《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同《清平乐·六盘山》和《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略有不同的是,前者写于中国革命的危机之中,诗人的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因而有着深刻的孤独、惆怅乃至苍凉悲壮的韵味;后者则因为诗人身处中国革命的转机之中,“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sup>[2]</sup><sup>326</sup>因而有着更雄浑豪迈的气势和信心。《浪淘沙·北戴河》则因中国已“换了人间”、“而今一扫纪新元”。在雄浑豪迈之外,更添了自信与从容。纵览此类诗作,则无论诗人身处顺境逆境转机危机,其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理性精神和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雄浑气魄,是一以贯之的。

那么,《浪淘沙·北戴河》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深沉思索和坚定信念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词作于1954年,其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运动也取得了胜利;国

民经济得到了恢复;西藏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新生的人民政府得到了巩固。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引导着几亿人民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面对社会主义大潮奔涌,怎样冲破前所未有的迷惘,怎样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引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诗人不可能从人类认识史上,从马列的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斯大林的逝世和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苗头,促使毛泽东特别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脱出苏联模式,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特点。这一思考,在他此后的《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的观点得到了印证。与此同时,党内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出现、中共领导层在党中央领导体制上的分歧等等,也在促使毛泽东思考着一个极其重大的课题:“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辩证法如何自由运用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sup>[3]</sup>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北戴河海滨“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的景观、大自然的奇妙无穷和变幻莫测与诗人面对的重大社会历史的课题异质同构。他站在北戴河,面对“幽燕”,“秦皇岛”,追溯历史,很自然地会联想起挥鞭跃马,北征乌桓,东临沧海,留诗碣石的魏武帝。

据载,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sup>[4]</sup>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到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sup>[4]</sup>诗人肯定曹操在封建王朝更替之际,“外定武功,内修文学”顺应历史潮流,不愧为古代的一位英雄。则铺写其“挥鞭”(武功)、“东临碣石有遗篇”(文学),表现出

的是诗人对治理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思考。

词作于夏季，“萧瑟秋风”显然不是当时所见实境，而是曹孟德诗《步出夏门行·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移用。洪波涌起的大海，具有何等博大的气度和胸襟：日月运行，星汉灿烂都源于它的孕育和创造。有慨于“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毛泽东坚信：魏武帝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尚且成就了一番功业，在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列主义，中国人民改变了自己受奴役的命运的今天，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大自然的容颜依然如旧，人类社会的发展却步履匆匆，不可阻挡，旧中国已经“换了人间”。这就是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的应答。诗人贯通历史和哲学层次的思考，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才是《浪淘沙·北戴河》所包含的丰富内涵。

作为肩负着把握社会发展航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毛泽东必须也必然要比一般人对人类历史有着更深刻的主体意识和忧患；必须也必然要对天地宇宙客观规律有更高的理解和探索；必须也必然要站在时代思想的最前沿，率先敲响未知世界的大门以引导群众推动历史的巨轮向前。毛泽东诗词的这种率先感知迷惘，在迷惘中探索的精神，这种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直一身以系天下安危”的人格意识，使其诗格词格蕴涵穷高极远的哲人意蕴和贯通古今的历史智慧。也是特定的文化精神所孕育所决定。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北宋周敦颐首创太极图说，再到王船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体系，毛泽东自幼就得到这一文化的熏陶。屈原、周敦颐、王船山注重探寻宇宙社会大本大原的哲人风范，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圣贤理想，向来为毛泽东所盛赞和躬行。他曾服膺顾炎武的求实精神：“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根溯本，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sup>[5]</sup>因而在战争中，则“此行何处”“今日向何方”，必明其山川；在平时，则“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贵在知其民情；“借问君去何方？”是对假冒共产主义的讽刺；“国有疑难可问谁？”是对事关国计民生者的慎之又慎。如果我们不曾忘记自20世纪50年代初直至今天，我们的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近40年的探索和思考的艰难，如果我们没

有忘记几十年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和失误（包括毛泽东的一些失误）；如果我们不曾忘记，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面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变质这一客观现实，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意识到：《浪淘沙·北戴河》一词所反映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历史潮头的深刻思考和坚定信念是那样真实可信和弥足珍贵。

那么，为什么对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乃至其他的一些篇章的理解欣赏，会出现如许的分歧呢？这不是读者、注释者的不高明，而是时代的局限。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思考和回答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问题，解放后不久，带领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有谁会宣称到了1954年，毛泽东还会感到迷惘，还需要深入的思虑？作为人民领袖，对人民，对新中国是无限关心热爱的，也会在诗词中有所表露。在当时《浪淘沙·北戴河》词“关心渔民、歌颂新中国”一说应是最能为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了。

事实上，正确的认识，总是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没有终极的。越是伟大的人物，越会产生前无古人，高出常人的迷惘和孤独。人民领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没有内心世界的冲突、痛苦，而在于他的内心冲突所包含内容的崇高。应该说，在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感情世界里，有迎接挑战的激奋和获得胜利的喜悦，也有处于逆境中的苍凉、郁闷；有同战友们配合默契，也有受到排斥压抑、不被理解的孤独；有同群众血肉相联而产生的充实感、力量感，也有难于同普通群众息息相通的焦虑；有清醒的观察、思考、和深刻的理论概括，也有错误的决策及面对未知世界预见的失误。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给自己诗词的批注中为我们留下了明示：“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份说对了，一部份说得不对。”<sup>[2]326</sup>除去上引《菩萨蛮·黄鹤楼》自注说明当时是“心情是凉苍的”之外。《清平乐·会昌》自注是：“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sup>[2]326</sup>《忆秦娥·娄山关》自注是：“万里长征，千迴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sup>[2]326</sup>这些都说明，只有承认诗人内在世界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才能在理解欣赏其言志述怀的诗作时，以诗人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为中心，而不只是以某种现成的政治原理为中心。对于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场面，体味过艰难

曲折人生的毛泽东的诗词,“我们情愿它是居于山巅和废墟之上,屹立于雪崩之中,筑巢在风暴里,而不愿它向永恒的春天逃避。”(雨果语)

最后要提及的是,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新中国成立后的诗词计 23 篇,两首《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头首礼赞新中国成立和民族团结,次首意有所同并记抗美援朝。两首虽分别写于 1950 年 10 月和同年 11 月,按其内容,也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压卷之作。《浪淘沙·北戴河》虽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三首,但表达的却是诗人面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大潮初起时的深沉思索和坚定信念,因而可视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首篇。

参考文献:

[ 1 ] 周振甫. 毛主席诗词浅释 [ M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67.

[ 2 ] 毛泽东. 毛泽东诗词选 [ M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 3 ] 卡德尔. 苏南会议·莫斯科会议·会见毛泽东 [ J ]. 世界历史研究, 1980(12).

[ 4 ] 凌霄《毛泽东九评曹操真意何在? 英雄相惜?》[ EB/OL ]. [ 2007- 07- 27 ].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content\\_8591097.htm](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content_8591097.htm).

[ 5 ] 中共中央文献办. 毛泽东早期文稿 [ M ].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0: 245.

[ 6 ] 萧永义. 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 [ M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黄声波)

(上接第 152 页)

曾祥彪先生契合当代读者的阅读心理,将严肃而圣洁的爱情放在一个个俗而又俗的交易场中,暴露于赤裸的阳光下,让人从丑态百出的权力与金钱的婚姻交易中找回那份日趋珍贵的“爱情”,让迷失的灵魂有一份寄托,让干涸的心田得到真正的滋润。也许正因为如此,曾祥彪先生的这部《爱情是什么》给人带来如此多的阅读快感与审美愉悦。

参考文献:

[ 1 ] 聂茂. 爱情的苍桑与生活的沉重 [ N ]. 文艺报, 2007 - 07- 14

[ 2 ] 曾祥彪. 爱情是什么 [ M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黄声波)